

天涯文论丛书



THE SPACES AND
MEANING OF
POSSIBLE WORLDS

虚拟世界的空间与意义

王 阳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哲学社会科学类



《虚拟世界的空间与意义》
《虚拟世界的空间与意义》
《虚拟世界的空间与意义》

虚拟世界的空间与意义

王 强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THE SPACES AND
MEANING OF
POSSIBLE WORLDS

虚拟世界的空间与意义

王 阳 著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拟世界的空间与意义 / 王阳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7. 6

(天涯文论丛书 / 王钦峰主编)

ISBN 978-7-227-03513-8

I. 虚… II. 王… III. 文学理论—研究 IV. I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0940 号

虚拟世界的空间与意义

王阳 著

责任编辑 吴月霞

封面设计 万明华

责任印制 来学军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高伟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cbmail@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银川市飞马印刷厂

开本 880×1230mm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340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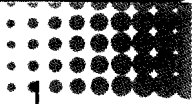
版次 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3513-8/I·923

定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天涯文论丛书”是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学学科新推出的系列研究成果。几年前,我学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文艺学多棱镜丛书”,在全国产生了较好影响。经过多年努力,一批教授、博士的新著相继完成,考虑到老师们多年来付出的心血,我们决定推出这批成果。本丛书原计划出版七本,但由于各书完成时间前后不一,所以其中部分著作已在学科支持下通过其他途径面世。

本丛书冠以“天涯”之名,主要源于该词在地理、文化上的狭义而非广义,这里指的是以湛江所在雷州半岛和在地理文化上与之具有密切关系的海南岛为主体的中国陆地最南端地区(属于古人所说的“海国”范畴)或南部粤语文化圈。在历史上,这一地区的文化向来不是一种封闭型的文化,也不是纯粹的红土文化和海洋文化,而是一种具有较强包容性和混杂性的文化。该地区的语言状况非常复杂,是一个由闽、粤和客家等多种方言组成的语言系统,这一复杂的语言系统实际上是长期以来历史发展、族群迁徙、文化杂交和人文积淀的结果,折射出两千年间中国地域文化的关系史。随着秦、汉、元兵的南进和元末明初战乱的爆发,闽越一带的老百姓、西江一带讲粤语的居民、福建汀州府及广东嘉应州的客家人纷纷南逃或南迁至雷州半岛、海南岛,致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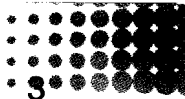
序



该地区的文化具有迁徙文化的成色。同时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该地区也有构建外向型文化的条件,这既是湛江能够成为我国汉代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的原因,也是1898年法国政府以租借广州湾为名而将其沦为殖民地的的重要因素。因此,以湛江和海口为主体的南海北岸地区实际上是当地俚僚文化、中原文化、闽语和客家文化及殖民地文化的杂混之所。

由于地处天涯,中国陆地最南端地区也是处罚逆子贰臣和天生具有反骨的知识分子的好地方。该地居民原以百越族为主,其文化生态属于原始的俚僚文化,且人迹罕至,有南蛮之地的称谓,地处中原文化圈的人士一般不来此地,除非被朝廷流放。史载,唐宋以来被贬谪到湛江或在湛江逗留的名人有数十人之多,其中寇准、李纲、苏轼、苏辙、秦观、汤显祖等名臣贤相和大文豪是其中的佼佼者。这些不得志者流亡至此,从雷州罗湖的水波中依稀领略到文化中心杭州西湖的美姿(苏轼有诗句“万里宦游来海国,一般乡景忆杭州”),所题楹联和留下诗词、墨迹无数。我们认为,从该地独特的地理和文化位置出发,中心和边缘、中原与南蛮、国内与国外、陆地与海洋、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均能够方便地收入眼底,进入流放者的反思空间。我辈均从北方迁徙而来,是苏轼等流放者衣钵的继承者,今日重踏古代流放者的足迹,除了与古人神交,体会此地文化的独特与混杂,从某种程度上还肩负着文化探询的使命。

不过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并不在探询该地区文化的特质,而是秉承天涯文化所蕴涵的流亡、反思和追求开放性、混杂性的基本精神,通过怀疑现有的成见,融合不同的视界,立足于文化和地理的边缘,探究国内外文学文化的意义及其互动逻辑。本丛书的主旋律是与来自中西不同文化中心的主流话语展开对话,思考文学与现代文化的动态关系,同时思考文学性得以发生的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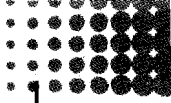
号学机制。王钦峰教授的《福楼拜与现代思想》通过悬置欧美学者持续使用的各种传统和现代的批评模式,把福楼拜独有的思想体系放在与现代主流思想、现代文化及其所凝聚的现代性价值观、西方理性主义价值体系的关系中去研究,得出了福楼拜是一个科学主义和历史决定论的反对者及现代文明的挑战者的结论。王阳教授的《虚拟世界的空间与意义》是对他四年前《小说艺术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所提出的叙事学理论的发展,该书在与国内外叙事理论的潜对话中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符号学思想,探讨了文本意义结构的形式规则,从多个侧面对文学文本的符号结构和文本内外诸种可能世界的主体、意义及关系进行了描述。赵金钟教授的《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与民间性》不仅探讨了中国新诗在取代旧体诗而在文坛确立自己的地位时,在语言、结构方式等方面所形成的新的审美特征,还探讨了民间性在中国新诗发展中持续存在的基本规律,为人们在现代化进程中重新思考中国新文学的特质提供了新的视角。张德明博士的《现代性及其不满——中国现代文学的张力结构》则从宏观上阐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张力结构的存在,指出这种张力结构的形成是由西方文学理念的中国移植和中国本土经验的现代转换的冲突性选择所导致的,从而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中两种不同的文学理解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些探讨为转型期的中国文论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界。

最后要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他们为这套丛书的出版付出了许多努力,他们的鼓励也给我们今后的研究增加了信心。

王钦峰

2006年12月

序



自序

我们在欣赏作品,为娱乐或研究而阅读的时候,不管面对的是以纸张为媒介的书还是电脑屏幕上虚拟的三维空间,也不管读的是抽象的文字符号还是生动具体的图像,都有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想象性经历和避开不愉快现实后的飘飘然感觉。这种感觉涉及到文学文本的空间、时间和意义问题,在理论上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2002年我出版了一本探讨这个话题的书,题名为《小说艺术形式分析——叙事学研究》,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该书全国发行,但市场反映冷淡,至今没有获得多少反响什么的。当今学术著作的命运大多如此,能够热起来的总是少数,本来没有什么好怪的。不过,我的那本书却由于另外一个缺陷,导致了我心中的读者们对该书的普遍忽视:那就是写得过于生僻艰涩。曾经看到过该书提要的许医农编辑说过,这种写法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当时我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由于某种原因已经不可能作大的改动。于是,那本书出版后就得到了“被人拒于千里之外”的结局。

在该书自序中我曾说:

本书仅仅是另一项主要研究即建构一个新的模态逻辑系统的导引,着重讨论的只是叙事学本身的问题。引入的矢量方程和 S_1 句型如何换算成某个模态系统的真扩张则暂时未能展开。



该书的后记中我又这样写：

作为整个构想的第一步，本书努力将科学精神引入文学，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讨论叙事学本身的问题，为建立新的模态逻辑系统做准备……能否依据这样的概念界说去构建新的模态逻辑形式系统，以及下一步的叙事学形式系统是否有运用上的价值，最终还是取决于批评需要。

这里提到的“自然科学的方法”主要就是我在该书中提出的视角关系矢量方程，以及与之相关的形式语言、模糊集合、模态逻辑的表达等等。这些表达方式对中国读者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界来说都十分陌生，当时采取那样的表述也有不得已的地方。我所关注的叙事学的视角主体问题，用自然语言来讲述总有不够精确之处，于是“取决于批评需要”的结果，是我的数学表述落了个出力不讨好的下场。

在同一篇后记中我还说，

我们的文化传统向来缺乏对科学的逻辑分析的信仰，缺乏超越个体感悟局限性的批评方法。屈从于非理性的权威话语的习惯性自以为是有现实的利益基础，我以为这是中国文化崇尚实用工具理性、轻视客观思辨理性的必然当代结果。国外学界针对西方现实中极端理性主义的弊端提出的那些时髦理论，恰好与本来就缺乏理性批判精神的中国传统人文学科的一般操作程式不谋而合，我以为这就是当代西方人文思潮中的各种非理性主义、直觉主义、相对主义理论近来在中国学界颇受欢迎的根本原因。中国不是西方，我们的人文现实所需要的首先是科学精神，是客观地认识现实的理性手段而不是对科学的批判和对理性的嘲弄。在中国目前如此严峻的现实面前用西方的时髦来加强

本来就对现代化起着严重阻滞作用的传统非理性认识的地位,那是非常危险的。

我至今仍然坚持这一观点。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是:中国学术传统的核心概念如“天”“理”“道”“圣”都不是可以严格的逻辑分析的对象,用公理化、形式化的方法递归地定义这些范畴似乎会导致其僵硬甚至死亡。换言之,用逻辑方法来改造这些概念的理想似乎不可能实现。从这个判断出发,则中国古典文论对立互补的“诗教”“载道”和“言志”“抒情”两大传统中,共同的依据就只能是个体的经验和直觉。当然,个体经验和直觉总与历史相关,由此得到的文论中的命题有其鲜活的现实生命内容。不能说命题本身必定正确或错误,但是这些命题本身没有一个严格的逻辑推论,因此不可能为它们找到一个形式上的证明。

从经验和印象出发的传统批评不需要也不可能经过严格的逻辑推演,就发展出了庞大的审美范畴系统。这些范畴对特定对象的审美经验描述曾经是有用的,也有其深刻性和合理性。五四以来的现代文论中社会功利性文学观与审美性文学观长期并存,前者重新定义所载之“道”,后者则将禅意与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结合起来。大体上两者都没有超越现实个体的不可以论证的经验性存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功利性文学观占据主导,教条化的文学理论一方面排斥纯审美,另一方面禁止非前提化的严格逻辑分析,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僵化。于是,在新时期大规模引入各种当代西方思潮的冲击之后这种文论终于完全“失语”。

新时期中国文论发展中各种思潮不断花样翻新,但在批评方法的层面上一直并没有放弃修养、直觉、趣味和感悟等传统依据,体系性建构的基础仍然是从习惯性经验判断提升得到的诸“原理”。从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热、弗洛伊德的性本能潜意识热,到中期叔本华、克罗齐、尼采热,90年代的海德格尔热、解构主义热、“反逻格斯中心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热、后现代“反本质主义”热,一直到新世纪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文化论、女性主义、东方主义、新历史主义、俗文学和文化工业等等,



“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就从来没有唯理主义“热”,没有逻辑分析“热”,甚至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象学“热”。传统文论的根基不仅没有受到触动,反而在西方反理性主义哲学的滋养下得到壮大,现在终于借日益得势的“反中心”之力“重见天日”。回首这一过程,令人不能不赞叹中国传统文论的生命力之强。

新时期中国文论中一度出现过具备科学色彩的“老三论”“新三论”插曲,但在经验印象传统的大背景下其具体批评实践中术语的隐喻性运用多于分析程序的可重复验证性,除了花哨的准科学甚至伪科学卖弄外没有留下什么实际建树。至于较为普及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由于其形而上追求被经验传统阉割,也仅仅在工具层面上稍微“温”了一下,根本比不上“反中心”之“热”。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其分支叙事学在远离历史和时代现实意义的技术性领域中工作,虽然成果斐然,也难免被视为学院批评中的“奇技淫巧”。

概而言之,新时期文论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有过各种非理性的“热”,但从来没有理性主义的“热”。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内有外。从外部原因看,20世纪初随着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发展,非理性主义思潮开始上升,但学术思想的主流仍然是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主义。世纪中叶,由于科学技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显现出来的力量,一部分西方社会活动家率先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等等全球性危机算在科学技术的头上,认为西方现代化过程在增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压抑了人性,实际上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助力,代表了理性对人的压迫等等。60年代后,随着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相继失利,嘲笑“理性局限性”成为时髦,“本质”、“客观”和“科学性”几乎成了贬义词。在后现代主义眼里,似乎逻辑斯中心已经被瓦解,理性主义已经被打倒,一切都成了所谓多元的、不确定的、不可表现的、断裂、模糊、破碎、凌乱、散漫、倒错、分裂、自毁的,“外延意义已经被内涵意义所淹没,叙述和逻辑高

潮已经为振动的、暗示的和含混的形象和象征所替代”^①,意义不再需要任何确定的形式而直接存在,对价值和意义结构的追问行为本身已经没有了意义和价值。以理性主义为宗旨的文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面的质疑,理由是“任何描述都是对事物的性质的歪曲”,因此“没有一种比其他系统更好或更自然的意义导出系统”^②。到了社会建构主义和科学元勘(Science Studies)思想家那里,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的揭露批判甚至演变成了对科学本身的直接攻击。在此大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受到逐渐增强的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影响不足为奇。

从内部原因看,中国的文化传统向来缺乏对科学的逻辑分析的信仰,缺乏超越个体感悟局限性的批评方法。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界在各种外来“主义”之中并无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的侧重,总的趋向是偏向工具和实用理性而忽略其形而上追求。出于传统的牵制,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文论的第一次现代化转型,就显示出比激进的非理性主义较具亲和力。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对前苏联文论体系和马列文艺思想的教条式解读基本上在工具和实用的层面上进行,以公理化、形式化和严格逻辑推演为基本要求的理性主义文论没有可能生存。新时期国门开放后,当中国思想界转向外部世界寻求参照时,碰上的又是非理性主义泛滥。那时主持追踪西方思想最新发展的一代文艺理论家,由于文理分科导致的知识缺陷,基本上没有评估现代科学思想及其社会价值的能力。在中国哲学界号称“显学”的分析哲学,也因为其坚硬的数学基础而令自我感觉良好的文学批评界望而却步。有限趣味与学术功利相结合,更有利于重直觉印象轻逻辑推理的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日益猖獗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沆瀣一气。于是,集中代表了理性主义的现代逻辑,其身

① 戴维·洛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见王瀚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85页。

② Hookway, Christopher, 1997, “Metaphysics and Semiosis”, *Semiotica* 114 ~ 1/2, pp. 169 ~ 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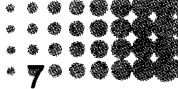


影始终遥远而模糊。

我并不想说当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引入一无是处。用现在的眼光看,由于文学作品不是科学著作,其内容的成功传达必然伴随情感和形象在经验和直觉中的感官生动性,不可避免地以非理性的情感和形象为基本追求,因此依据生命体验的批评有其不可取代的特定价值。例如,强调体验的不可重复、重视个体权利的生命哲学,在解构“伪崇高”方面功不可没。但就是这些积极的批评大多也不过是对阅读印象的近似性传达,依据的仅仅是暂时有效的经验现实,不属于可重复验证的科学客观的分析。这些批评所使用的赞美语言完全可以被某种现实的而非理论的力量强行授予特定的文化垃圾。在更广阔的历史视角中,哪怕是具有“历史的和美学的”双重追求的批评和标榜人文精神的实证分析,在与敌手论战时采取的方法往往与依据生命体验的批评雷同。这一现象长期反复出现,暴露出中国文学理论的两个难于弥补的致命缺陷:一是依据印象的隐喻式话语操作,二是对权威话语的非理性屈从。这两个缺陷也是庞大的中国传统文论的致命伤。在此系统中,文学理论往往缺乏对权威话语的合理性的反思,没有独立的科学品格,更没有超越眼前现实限定的形而上思考,批评者在屈从地表达自己的印象时很难客观有效地分析对象的意义。

当代西方风头正盛的非理性主义思潮,不过是对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理性主义压迫的反弹,非理性与理性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如此而已。中国不是西方,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首先是科学精神,是客观地认识现实的理性手段而不是对理性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嘲弄。国外学界针对西方现实中极端理性主义的弊端提出的那些时髦理论,恰好与本来就缺乏理性批判精神的中国传统人文学科的一般操作程式不谋而合,在中国用西方的时髦来加强本来就对现代化起着严重阻滞作用的传统非理性认识的地位,有百弊而无一利。

当前又是商业化冲击下的消费文化热、多元文化论和由之带动的俗文化热,各种“后”现代热及其核心命题“反逻格斯中



心主义”热、多极世界背景下的非本质主义热、读图时代的“感觉至上”(这个词语来自生命哲学)热,已经遭受冷落的文学理论只有通过对大众传媒、日常审美、身体时尚、文化产业、全球化、网络写作和阶级、性别、民族、历史的研究显示自身。“热”潮中学者们反复强调,每一种文明都有其天然合理性,每一种文化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每一种价值体系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优点,如此等等。掩藏在这些“政治上正确”的提法之后的一个实用目标,似乎是早就处于危机之中的西方从古老的东方文明中发现了自己失落的道德信仰,于是可以用“东方传统价值观拯救没落的西方文明”。这些说法已经流行了几十年。既然中心和边缘应当或已经消弭,作为东方文明一个成员的中国其思想界似乎没有任何理由不顺耳。中国文论家们有的跟在西方后现代大师们后面对科学进行“祛魅”,有的趁西方“反中心”之机把自己宣布为 21 世纪的中心;从文化相对论到意义相对论,从审美自由主义到反本质主义的各种思潮都得到了包容和倡导。其实拉康的拓扑学、克里斯切娃的选择公理和哥德尔定理、德鲁兹的微分学、鲍德里亚尔的混沌学、鲁丝·伊里伽莱的流体力学等等,都不过是一方面利用他们并不懂的自然科学的威望为自己壮胆,另一方面又贬低科学特别是科学所遵循的严格的逻辑规则和客观性原则,如此而已。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科学大战(Science wars)①硝烟甫定,自然科学家代表理性主流对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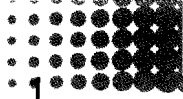
① 1994 年美国生物学家格罗斯与数学家莱维特出版《高级迷信》一书,对当时风头正盛的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随后,1996 年 5 月 18 日,美国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发表了著名的“诈文”,触发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由科学家、持实证主义立场的哲学家同与“反本质主义”、“反逻辑斯中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之间的“科学大战”。这场论战涉及范围之广和持续时间之长,在人类思想史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国内科学哲学界追踪了论战过程,但是文论界几乎毫无反响。当德里达、克里斯切娃、拉康、瓜塔里和德鲁兹等后现代主义的头面人物受到抨击和嘲笑时,他们在中国得到的推崇和膜拜却有增无减。导致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我以为既有学术传统方面的原因即士大夫对十三经之外所有“雕虫小技”的轻视,也有当代社会原因如由高考文理分科延续而来的入文学者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的普遍欠缺,如此等等。



现代主义的振聋发聩的批评在中国文论界竟然毫无反响,这一反常现象不禁令人疑惑:本来就缺乏理性精神和逻辑分析的中国文论,到底跟在“反理性中心主义”、“反逻辑斯中心主义”的风头后面反什么?

注意到这些热潮中理性和逻辑被看做对人性实施压制的异化力量,“科学”和“宗教信仰”被看做两种平行价值体系,“现代性”被界定为反面角色,为民主、科学和现代化奋斗了100多年的中国人就不可能无条件地赞同这些“时髦的胡说”(Fashionable nonsense)。具体到中国文论的现代化转型问题,我们更没有理由放弃曾经追求的理性主义目标,没有理由放弃科学性逻辑性而退回经验式印象式批评的遗产之中,心安理得地接受对我们的匮乏毫无体验的“他者”不怀好意的恭维。

我以为,从文化的相对性到文本意义的相对性,从大众文化的非理性到学术的功利性,其基本线索就是来自非理性主义的“传统积淀”,其中包含着大量的逻辑断裂和逻辑背谬。概而言之,擅长于包容逻辑矛盾的中国传统思维,含有不利于民族文化健康发展的破坏性因素,应当在科学信仰和逻辑方法之下得到严格的分析批判。为此笔者拟采取唯理主义的立场,以期更鲜明地提出问题。从思路的连续性上说,今天这本书应当是朝着这样的目标,在“建构一个新的模态逻辑系统”的方向上继续努力。然而,进一步的研究困难重重,加上种种条件限制和上一本书的命运,使得我不得不认真考虑这样的现实问题:批评理论和数学游戏毕竟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之中,处于大众性娱乐活动中的文学文本本质上不欢迎“枯燥”的缺乏“鲜活情感”的逻辑推理。于是,我决定换一个写法,尽力用通行的普通的语言来讨论文学文本的空间、时间和意义。虽然不能够完全避免令人不快的公式和方程的再度出现,但这些数学表达将是通俗的,一般具有中学数学基础的读者都能够轻松掌握。同时,为了避免直接从我在一些学报上讨论过的叙事学基本概念和上一本书的结论出发,本书将从头说起,以完整地表达一个独立的话题。



导 论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启蒙主义强行整合世界的努力是失败的,欧洲文艺复兴所奠定的理性传统现在已经被颠覆,现代性留给当代人类的只是一个破碎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图像和符号,本质和实在已经被图像和符号吞噬。甚至图像和符号本身也没有统一的意义,一切都是相对的、不确定的、混乱的,在能指的嬉戏和含混的隐喻和象征之后什么都没有。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后现代世界中,负载着意义不确定的图像和符号的文本,或者说物质形态的媒介,也始终存在于人类唯一的物理时空之中的确定坐标点上,以其作为客观世界中的“物”的躯体捍卫着铭刻在这个物体上的符号的稳定不变。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传统对“此”唯一物质世界的解释有很大的差异,尽管关于“此”唯一物理世界的任何认识总是有限的、不充分的,这一点却无可争议:文明进步极大地依赖于关于“此”唯一物理世界的科学知识积累,而这些知识又以符号的形式保存在负载符号的“物”的身体上。

至今仍然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群体不可能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奇异生物。生生不息的地球生命的本性就是保存有利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东西,对人类而言,认识这个真实的世界出自延续自身生命的本能需要,而什么是“真实”必须由这个需要本身来进行判断。为此人类通过巨大的努力,才终于找到了获取可靠知识的正确途径,建立起了现代科学的方法和规范。为了人类生命的存在和延续而发展起来的语言符号系统,其意义和价值



就在于保存、积累和传递出自生命需要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保存和传递,一般以文本生产、消费、传播流通的形式出现。任何文本都可以看做一个传递意义的既定图像符号组织,该组织只能通过物质媒介才能够存在,才能够进入文本的生产、消费、传播流通过程。因此,破碎和不破碎的文本意义即“彼”意义世界都必然有一个物质层面。文本物质层面存在于“此”唯一物理世界上,这个“此”世界只能是对生命而言具有统一强制意义的世界。不仅如此,近代史还赋予了“此”世界的文本以统一的形式,例如书本装帧形式中长宽比例的黄金分割,电子文本和图像信息中的数字代码的编码规则,如此等等。

如果承认“此”世界中的文本物质层面,作为包围着人类生命的外部世界的一个物体,起码在其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过程中具有确定的实际意义和使用价值,那么由此应当可以推论出这些特殊实用物体,即负载一个“彼”意义世界的“此”世界中的确定物,也有某种确定的实际意义和使用价值。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后现代主义视角中破碎和不破碎的“彼”意义世界并不是“此”唯一物理世界的正确图像,或者说后现代世界上图像和符号的“彼”意义世界,建立在了对生命而言具有确定强制意义的统一物质“此”世界的躯体上。再推论下去,如果人类通过符号系统才得到发展和保存的以理论形态存在的“彼”意义世界其实无意义,那么人类这种生物就根本缺乏哪怕是近似正确地描述和反映“此”唯一物理世界的能力,为满足生命延续的需要而利用自然规律的技术就不可能得到发展。假如出自人类的生命本能直接需要的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都不过是意识形态偏见甚至是理性的自蔽,那么一种根本就缺乏正确认识能力的生物为何主宰着“此”世界,以及人类这个物种得以存在发展并且主宰世界的原因,就都不可理解了。

如果说人类曾经正确地认识过“此”具有统一的意义和价值的唯一物理世界,意思就是人类曾经拥有正确的图像和符号的“彼”意义世界,该世界在后现代时期随着知识的地域化和主客